冼玉仪著《权力与慈善》

张璐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POWER AND CHARITY : A Chinese Merchant Elite in Colonial Hong Kong，香港大学出版社 2003 年出版，作者 Elizabeth Sinn（冼玉仪），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香港社会和文化研究。

本书于1989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以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的标题首次出版。与之相比，再版的书名突出了研究的关键词：权力、慈善、商人、精英、殖民地。围绕香港东华医院委员会这一研究对象，慈善与权力是其功能，商人与精英是其身份，而殖民地则是其故事发生的特殊背景。本书探讨的焦点是，东华医院委员会作为当地精英组织，如何在香港早期殖民地历史中扮演其政治与社会的中心角色。作者将东华医院作为理解香港历史与社会的钥匙，借以打开其早期殖民地时代的多维空间。他以华商在组织与经营医院过程中权力的兴衰演变为线索，揭示了华人精英群体与英国殖民政府、大陆中国政府、香港华人社区之间的复杂关系。

香港早期历史研究大部分集中在总督和殖民统治，或者仅仅把香港看成中英外交事务中的一个问题。而本书不同之处在于通过重构当地组织——东华医院的历史，从深度上检视了香港社会的特性，并且在若干层面上揭示了东华医院的历史意义。在医疗卫生层面，这所旨在保护华人免受西医治疗的“中国医院”最终被整合进西方医疗体系与西方公共卫生机制；在社会政治层面，作为非政府组织的东华医院委员会最初与殖民政府的对抗关系逐渐改变，随着新式华人精英被整合进政府权力体系，最终走向与殖民政府的联合。全书以华人社区与殖民政府的“分离”（segregation）为开端——医疗层面和政治社会层面——以“整合”（integration）为结束，揭示了香港殖民地早期历史的特点。

东华医院绝不仅仅是一所医疗机构，19 世纪时它为香港和海外华人提供了大量不同种类的服务，这些服务有很强的社会与文化意义，因而促使医院的负责人成为华人社区的领导。作为第一个被殖民政府承认并具有高度组织化的商人精英团体，医院委员会充当着华人社区和殖民政府之间的媒介，并且逐渐成为殖民政府管理与控制社区不可缺少的工具，因此在殖民地香港扮演了至关重要的政治角色。它是华人社区事务的代理人和管理者，担负着救济与慈善，解决民事争端，保护香港华人的责任。随着其权力与威望的兴起，英国殖民政府越来越感到威胁，猜忌与担心使他们设法限制医院委员会的权力。于是，殖民者对香港华人社区的统治由最初的“隔离”逐渐转变为强制性地介入。1894 年的腺鼠疫是一个爆破点。各种矛盾在此激化，引发华人社区、社区精英、英国殖民政府、中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冲突与激烈斗争。医疗文化与学术的对抗背后是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政治的对抗。最终，英国殖民政府使用国家强制力量把他们的规则强加给中国人，包括西方近代医学与近代政治，完成了殖民地政府权力与本土精英权力的整合。

医院在香港之外的影响同样显著。它努力与大陆中国政府建立稳固的联系，它为大陆救荒所做的突出贡献得到大陆政府赏识。大陆政府同样渴望通过东华医院领导层对香港施加影响。本书展示了香港商界精英希冀根据中国传统价值原则获得社会合法地位，以及在中华帝国秩序中得到承认所带来的复杂图景。当香港华商与殖民政府对抗并试图建立社会和政治地位时，他们同样热衷与大陆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然而这往往又是麻烦与冲突的来源。东华的历史完美地说明了香港处在两大帝国之间的位置所带来的双重特质。

本书分为七章。前三章介绍东华医院建立的背景和组织结构。后四章分别是东华医院

委员会与各方冲突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

第一章介绍东华医院出现之前的香港华人社区。1869 年东华医院的建立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是香港医疗史、社会史和政治史的转折点”（第 7 页）。在这之前，实际管理华人社区事务的是诸如寺庙委员会、义祠、南北行、地保等当地组织，英国殖民统治不能有效介入华人社区。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年后的再版序言中，作者对华人与殖民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反省，他受 Christopher Munn 的 *Anglo-China: Chinese People and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1841-1880* 一书启发，对间接统治、种族隔离和小政府这些普遍的前提假设提出批评，认为自己“忽视了”一个拥有强大军队和警察机构的殖民政府，在东华医院建立以前实行直接和压迫性统治，医院的存在使得政府用更有说服力的社会管理以及医院的道义去完善它的统治机构，导致直接和间接统治的结合（序，第 *xi* 页）。

另外，作者在第一章提出了一个有助于理解全书的重要问题，即中英政府对香港岛管辖权的争夺，这反映了中西异质的政治思想。中国政府认为所有华人都应该受中国政府的管辖，因此普通华人和中国政府都对领土管辖权的轮廓模糊不清。而西方的国家主义（nationality）政治思想是以领土主权为基础。对香港管辖权的争夺反映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殖民地移民的双重效忠。这也是东华医院、中国政府、殖民政府关系错综复杂的根源。与中国大陆在经济、家族、血缘和政治上的紧密关系使得香港华人更易接受中国政府尤其是广东政府的影响和控制（第 5 页）。东华医院的经验揭示了中英两种政治动力之间的较量，在一定程度上大陆政府的存在影响了殖民政府政策的制定和香港华人社区的自然状态。

第二章分析东华医院建立的背景。作者认为，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为医院建立提供了必要条件。华人社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它的领导人有经济实力和组织能力将医院付诸实践，同时，又迫切要求政府承认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地位。由于文化代沟的存在，当地华人不接受英国政府提供的医疗设施，香港作为移民港口，产生了很多医疗和福利问题。政府与华人社区之间缺乏交流，政府用来管理华人社区的登记总监制度也不能改善这种状况。特殊环境促使东华医院成为香港第一所由华人经营并为华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华人社区领导第一次得到殖民政府的官方承认，值得注意的是，它以医院委员会的形式出现。

第三章介绍 1869 年—1894 年医院的管理、组织与发展。“医院”（hospital）的概念来自现代西方，hospital 一词意味着一套特定的管理组织模式。而东华医院是一所由中国人开办，为中国人服务，只雇用中国医生，使用中医治疗的纯粹的中式医院（a Chinese hospital）。作者形象地将它比喻为“外国瓶子里装着中国酒”（第 52 页）。它的管理具有传统中国自治组织的特点——行政权力的混乱与分散，职责轮换，一致表决。但是作为一所医院，它又不属于传统组织，因此对它的经营与管理便构成了矛盾的焦点。

中西医对峙是本书另一个需要深度考察的主题。东华是展现两种文化冲突的舞台。值得一提的是，东华医院也作过中西医结合的简单尝试，制定过一项中西医综合训练的教学计划，尽管以失败告终，但是这种勇敢和积极的尝试使东华医院成为医学史上的一个坐标。而且虽然其标榜中医治疗，但是积极推广牛痘术被认为是东华医院在医学史上的又一大突出贡献（第 67 页）。

医院组织结构由董事会、总务委员会、普通成员组成。董事是商界精英，由各行会推举产生。作者认为，选举机制是一种将商业力量转化为社会影响力的手段，在中国城市中行会是重要的社会与经济因素，而且在晚清逐渐成为一种政治因素。在这方面，行会扮演主要角色显示了香港与中国城市极为相似。但是商人的影响力在香港更为突出，因为香港缺少学者阶层，商人们不用竞争就取得了当地精英的地位和角色。以行会为基础的结构使得医院能够影响华人社区的草根阶层，并从中寻求支持。作者还论述到香港行会的优势地位与会馆弱势地位之间的对比。认为是行会而不是会馆提供了香港社会活动的主要框架（第 56 页）。因此东华医院的管理体系体现了香港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然而，在再版序言中，这成为作者最

想收回的一个论点。他对东华委员会过于单一的身份提出质疑，转而认为既是行会领导又是同乡会领导，既是商人精英又具有知识分子倾向，多重身份的现实和多种利益冲突可以纠正对香港社会常常做出的过于一般化的结论（第 7-8 页）。

第四章进一步分析东华医院委员会作为本土精英的功能和地位。东华医院委员会的地位在 19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初达到全盛，医院委员会以空前的权威和影响力执行着当地精英的职责，对香港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它维护华人的道义，保持华人的习俗，实施华人的法律，在外国政权下保护华人的利益。通过医院委员会，华人社区能够更有力更连贯地表达意见，因此加强了社区的民族自尊心和团结心。华人社区和殖民政府之间的关系也由此改善，政府越来越意识到与华人社区合作的价值。委员会也改变了不同种族社区之间的关系，它的高姿态引发了西方人的不满和猜疑，使多种族社会的矛盾尖锐化。医院委员会的影响绝不仅限于当地，它和国内移民以及海外华人的联系使其成为华人世界的枢纽。这些活动不仅证明了医院的历史重要性，而且证明了香港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性。

第五章标题是“批评、对抗和控制”，描述了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东华医院委员会地位的上升趋势怎样受到挑战及其统治地位怎样受到削弱。医院委员会超出医疗之外的功能与权力最终引起西方人的猜疑、恐惧和批评，他们甚至担心医院成为中国政府控制香港人的中介。殖民政府开始限制医院的社会政治功能，重新加强登记总监的权力以充当殖民政府和华人社区之间的沟通渠道，允许华人进入立法会、治安委员会、商会等政府组织进行政治参与。这些举动使人们看到一个普遍的趋势，就是殖民政府更加广泛和更加有组织的管理，这意味着对华人更直接的统治。另一个趋势是华人精英以个人身份进入官方权力结构之中。简言之，香港社会出现了政治整合的倾向。同时，华人社区内部的离心力开始增加，具有新思想的精英们虽然不一定直接批评东华医院，但是他们在以消极或积极的形式修改着它的功能和角色。通过加入新的政府机构，他们显示了获取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新途径；通过加入医院委员会，他们改变着其与政府之间的对抗关系。到 19 世纪 90 年代初，医院委员会的地位开始走向衰落。

第六章标题是“危机：1894 年瘟疫”，论述瘟疫如何给东华医院和香港社会带来危机。传染病在历史上普遍刺激着公共卫生改革，在英国，公共卫生管理的集中化与标准化趋势开始于 19 世纪 40 年代。1894 年腺鼠疫成为在香港推广这种趋势的绝佳契机。逐户检查，隔离治疗这些完全陌生的卫生措施遭到华人社会的顽强抵抗，东华医院尽力发挥着它“华人保护者”的角色，但是西方医生与殖民政府的强制干涉使其力不从心，引发华人社会的极大恐慌与对东华医院的强烈不满。东华医院陷入危机，不仅医疗、社会与政治各方面的自治权力受到威胁，而且在华人社区中的威信与地位也受到动摇。

第七章标题是“新的危机：走向整合”。这一章是东华作为“纯粹”的“中国医院”的结束，时间终止在 1896 年。这一年，总督指派了一个委员会对东华医院进行调查，引入的一系列改革标志着其作为现代医疗机构的开始。尽管表面上是对医疗工作的干涉，但是其社会政治意义更加深远。根本问题不在于医院是否应当接受西医，而在于医院委员会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治组织，是否能够抵制来自殖民政府的干预，以及作为华人社区的保护者，是否能够保持其“中国性”，这种能力，正是一个组织能否成为华人社区领导者的先决条件。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新式华人精英继续涌现，他们可以同时服务于华人社区和殖民政府，新的政治准则与管理策略改变了原来医院与殖民政府对抗的局面。1896 年的医院改革标志着香港在医疗卫生以及政治和社会诸方面逐渐整合过程的开始，西医的引入不但对于作为医疗机构的东华医院具有历史性意义，而且对其作为社会和政治机构，以及对于整个香港社会都具有重大影响。

纵观全书，不论在医疗层面还是在社会政治层面，都以“分离”（segregation）作为开端，以“整合”（integration）作为结束，这不仅是东华医院早期历史的起点和终点，也是殖

民地香港早期历史的起点和终点。本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大多数关于香港的研究存在简单的“殖民”（pro-colonial）或者“反殖民”（anti-colonial）倾向，这种粗糙的一般化结论模糊了香港原本多元的社会与政治动力（序，第 *x i* 页）。在本书中，作者没有采用殖民压迫者对立于华人被压迫者这种简单的二元分析架构，他注意到英国殖民当局对华人的医学态度以及公共卫生政策，管理策略，是多种因素与多元力量较劲下的复杂产物。

作者在丰富的一手材料基础之上，包括大量前人从未使用的东华医院档案，保良局档案，香港、英国公共档案处档案，美国国家档案，以及当代中英报纸，将东华医院的故事细致入微而又生动详尽的展现出来，复杂的冲突使故事情节环环相扣，读来引人入胜。它使我们认识了香港近代史，中国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史的多个历史侧面，丰富了很多细节性的历史认知，充实了原来过于框架化和粗线条的历史概论。本书内容丰富而且分析敏锐，它不仅是一项关于殖民主义、医疗史、城市人类学的综合研究，同时涉及到慈善、商业、政治、精英、移民等诸多领域，这些领域都可以进一步拓宽与进行比较研究，读者可以各取所需，受到不同方向的启发。

值得一提的是，百余年来，东华医院在香港历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使其顺理成章成为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项目，并已拥有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冼玉仪所说，东华医院本身的历史档案就是丰富的宝藏，“如果不好好的研究东华的历史，实在是学术界的损失”。[1]这种以某一机构为基点进行的横向领域扩展研究以及纵向意义深入挖掘，是我们进行地域社会史研究的突出范例。同时，作为殖民主义领域的研究，它强调了华人在香港生活的“香港叙述”或“香港历史”，改变了以往殖民话语中的香港华人“失语”的状态。[2]而对医院的研究又不可避免的触及医疗史领域，本书生动地描绘了中西医冲突下民众的医疗体验以及中医在被动边缘化过程中的种种焦虑与应对。但是本书只是以医疗史为切入点，主要探讨其背后的政治与社会运作，因此为进一步研究香港整体医疗体制与运作留下了很大的书写空间。

收稿日期： 2008-12-5

作者简介： 张璐，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生。

[1] 冼玉仪，刘润和主编：《益善行道——东华三院 135 周年纪念专题文集》，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6 年版，序。

[2] 参阅胡成：《动华故事与香港历史的书写》，《读书》2003 年第 6 期。